

「現場」與文化再造：未完成的思考 “Site” and Cultural Regeneration: Unfinished Thinking

—— 編輯室報告

本期專題「文化再造：歷史與音樂現場」收錄的三篇文章，最初投給了「再造歷史現場」（34期）和「音樂的躁動」（35期）兩個專題，因為審查過程稍有延宕而未能即時收錄。為此，我們特別感謝客座主編的諒解與作者的努力。雖然這兩個專題在內容與取向上很不相同，但本期刊發的三篇文章卻意外地形成了一個關於文化再造的思考，尤其突出了現場這個問題。「現場」是漢語裡的一個日常辭彙，在日文、韓文和越南文裡都有，表示「事故發生的地點」或「正當其時其地」的意思（見《教育部重編國語字典修訂本》）。這兩者意思不盡相同，但都帶有強烈的立即感，不只強調是事件發生的地點，更是事件正在發生的事實。「現場」是立即的、當下的，它的存在意味著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地點見證正在發生的事件；現場是見證，乃至穿透歷史的視角。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本期的三篇專題文章，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關於「再造歷史現場」的政策形成與治理機制（高郁婷、王志弘）、臺北大稻埕襲產再造所產生的文化經濟（岑學敏），或是新冠疫情中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生存所面臨的結構困境和挑戰（簡妙如），都突出一個甚為關鍵的問題：即所謂的「現場」已是再造的成果，它也許承載著歷史，但不再指向過去：歷史現場是文化政策、經濟理性與意識形態所要治理的空間，歷史只不過是背景，而「現場」更重要的性質是消費與紀念，是國家理性整合經濟理性所試圖重新構築的地方；同樣的，大稻埕雖然是臺北著名的歷史街區，有深厚的文化傳統，但是在城區士紳化的驅力下，襲產的歷史意義早已被文化經濟（或曰「創意文化產業」）所吸納與穿透，必須在觀光客的凝視與地方產業的復甦中再造自身，以經濟成長證明其歷史與文化的價值。就此而言，文化與都市治理政策下所謂的「歷史現場」其實是文化治理與經濟改造發生的地點，一如我們熟悉的、散布全臺，看來大同小異的歷史老街，或是一個又一個以懷舊為尚的歷史文化園區，不論懷念的是日本時代的宿舍或是民國時期的眷村。「現場」的保留需要修舊如舊，但那不過是歷史的外殼，其內涵早已被政治與經濟所穿透、改造或取代，形成另一個可以從事消費與商業行為的博物館空間。

同樣的，俗稱Live House的中小型音樂場館亦是被經濟所穿透，是具有音樂與餐飲不同功能的「斜槓」或「混種」現場。相較於演奏交響樂所需的高挑而典雅的音樂廳（musical hall），或是如香港紅磡或臺北小巨蛋那種可以舉辦萬人演唱會，讓眾人隨著音樂舞動的「體育館」（stadium），Live House或是結合了音樂與酒精的夜店則提供了體驗音樂的不同空間，提醒我們音樂體驗與空間之間密切而多元的關係組構。但是，相較於歷史現場的意義往往是由文化與都市治理的邏輯所給定的，音樂現場（擴而言之還可納入影

音串流平臺)正在改造音樂的意義,乃至於音樂生產的方式。簡妙如的文章尤其突出了中小型音樂場館工作者的多元與多重勞動,提醒我們音樂現場——一如歷史街區和文化園區——亦是勞動的現場,並且還會彼此交疊與延伸出不同的現場。這意味著現場的意義不僅僅在於事件發生的地點和當下,更在於構築了其地其時的歷史條件和結構狀況。於是,現場可以作為理解文化再造的線索和方法。

從這個角度出發,本期收錄的兩篇學術論文可以視為對文化再造與現場思考的延伸。劉人鵬回到康有為的《大同書》裡字斟句酌,提醒我們清末的烏托邦想像中的性別解放不能被獨立看待,視為某種先驗的進步價值,而要回到思想生發的歷史現場中去理解性別解放與烏托邦想像的關係。劉人鵬強調,在康有為提倡「去形界保獨立」、「以公家機構來替代家庭的角色」等基進主張的背後,有著差異共存與向上認同的邏輯矛盾,性是關鍵現場,因為它交疊了情欲解放以及優生學的雙重想像。劉人鵬指出,這個矛盾之所以存在,一方面反映了烏托邦思想與傳統婚家觀念的激烈鬥爭,另一方面則折射了19世紀以來現代性與殖民主義同構中的種族主義與優劣階序,影響著康有為對於解放的認識。因此,後人對其思想的繼承不能採取限定繼承的方式,只看到其符膺當下進步價值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思想現場中種種多元交錯的歷史包袱和承擔。朱盈樺從藝術自出版的現象出發,思考後數位技術與媒體如何挑戰與改變我們對於美學實踐的認識,有效地將對現場的認識與文化再造的思考擴延到了數位與紙本印刷的交界處。當數位技術得以延長書本的保存,擴大其流通,紙本書如何面對與介入數位技術,創造出新的書寫與思考的現場,就成為藝術創作者不得不思索的問題。在朱盈樺看來,數位出版並非紙本書的末日,而是後數位美學實踐的到來。文化再造需要對媒介與美學的關係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唯有離開媒介決定論的陷阱,文化才能從傳統的生產關係中解放出來,在不同的現場,尋找再造文化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關於現場的討論指向了對文化再造的豐富思辨與多元實踐。的確,傳統必須與時俱進,但是文化再造如何能夠不只是國家治理與經濟理性縝密計算的結果,而得以保有或回復文化生產的解放與批判動能?這對文化研究這個學術社群而言,仍是未完成的思考,有待同仁繼續推進,不撓不棄。

本期亦收錄了一組書評論壇,以五篇文章分別討論張政遠的《物語與日本哲學:哲學的民俗學轉向》和廖欽彬的《戰前臺灣哲學諸相:實存的行旅》兩本重要的哲學著作,以及一篇書評,評介潘律的《形象、想像與奇想:重映大中華的二戰紀念碑》,都值得讀者關注。

最後,《文化研究》學刊已於今年5月完成編委會的重組,改由臺大地理系的黃宗儀老師接任主編,組成新的編委會,引領文化研究在中文世界裡的討論與交流。在此,我謹向宗儀和新任編委會表示祝賀與敬佩之意,相信在她的帶領下學刊會有令人一新耳目的發展。

